

英國經濟競爭力、美伊戰爭與歐洲防務合作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系

摘要：

本文分析英國在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面臨的交織性挑戰。英國經濟在邁入 2026 年之際經濟表現疲軟，而隨之而來的美伊戰爭進一步威脅了經濟增長並推高通膨。與此同時，為了應對地緣政治動盪，英國政府面臨龐大的國防支出壓力，這不僅考驗著英國的財政預算與經濟競爭力，也深刻影響了其與歐洲盟友在防務整合上的未來走向。此外，近年來英國政經討論中盛行的衰退論，悲觀的看待英國國家行動能力。這種看法不只是經濟成長放緩，顯現政策菁英與社會普遍認為英國正在不可逆衰退，反應在投資信心下降、政策短視與國際角色收縮。然而，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外交與情報能力與軍事與聯盟網絡都仍然在發揮作用，英國仍擁有多項關鍵資源，能以制定長期戰略來避免短期政治操作，可以重建國家信心。脫歐後英國以「全球英國」定位，強調國家戰略一致性與經濟政策長期性，英國應該發揮既有優勢，而非追求全面競爭。因為中等強權的影響力不完全取決於 GDP 或軍力，而在於戰略運用能力。

前言：經濟競爭力之現狀與挑戰

英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問題是典型的內外交迫，不論是普遍生產力停滯，還是各地區間的發展不均衡，都進一步惡化脫歐後對外貿易的摩擦，為英國經濟帶來高度不確定性。在中美競爭與全球秩序變動下，英國如何達成全球英國的定位？除了經濟與金融表現，更取決於其在印太戰略、歐洲安全與英美關係中的實際作用，倫敦必須務實思考作為中等強權，其戰略定位的優先是美國還是北約？而美伊戰爭後工黨籍首相 Starmer 已經以行動表現出不願意與川普政府採共同軍事行動。這不僅是來自於伊拉克戰爭的教訓，更是由於財政狀況的低迷。

根據路透社 2026 年 3 月的統計數據，英國經濟在 2025 年第四季度僅增長 0.1%，顯示出極為脆弱的成長勢頭。如此不振的增長背景，可理解工黨政府在戰爭爆發前，已然明瞭自身經濟已處於步履蹣跚的狀態。雖然家庭儲蓄率的上升提供了一定的緩衝空間，但整體需求依然低靡。在美伊戰爭的衝擊下，不可避免的全球通貨膨脹，直接打擊英國的消費需求。進一步而言，極低的經濟增長率使英國央行在調整利率以對抗通膨的手段受到侷限，因為央行還有刺激經濟增長的責任而陷入兩難。央行作為的侷限就是英國的財政結構性問題。經濟停滯直接帶來的影響就政府的稅收能力大受打擊，百工百業困窘的營收使得各式的稅收迅速縮水。從而帶來的是無法應付激增的公共與國防開支，此刻的財政顯得捉襟見肘。

要使得英國政府能解決各式問題，除非進一步發行國債，然而英國國債目前面臨顯著壓力，10年期收益率在2026年3月升破4.9%-5%的關鍵水準，接近2008年金融危機前高點。主因為通膨頑固、能源價格上漲導致風險重估。市場擔憂財政惡化，使英國長期借貸成本成為G7集團最高，反映出市場對高負債的擔憂。由於內部經濟與對外區域安全雙重壓力，檢視國防承諾變得極其重要。如果英國無法有效解決國防支出的財政來源，其經濟競爭力的下降將削弱其在歐洲防務整合中的領導地位與話語權。然而，儘管面臨預算壓力，英國在歐洲國防中仍具備優勢，其國防預算規模與紮實的工業基礎，使其具備深厚的軍備生產能力，一直是歐洲軍事技術與裝備供應的重要支柱。不過，歷經10年的脫歐英國與歐盟機制產生已經發生制度性脫節，並處於孤立狀態而無法與布魯塞爾達成「歐盟集體國防倡議」，像是歐洲國防基金的條款仍無法達成共識。這主要是來自於主權的摩擦，歐盟還是將英國描繪為對主權痴迷的鄰居，對重新整合防務資金與機構方面依然存在障礙。由於美國在伊朗戰爭期間表現出對於歐洲的嚴重不滿，迫使歐洲必須走向真正的戰略與防務自主，這就促使英國的角色顯得更不可或缺。歐盟短期內能做的最佳策略，就是放寬條件讓英國重新加入大陸的國防機構與基金。

二、美伊戰爭對英國防預算與北約承諾的連鎖效應

多極體系帶來的地緣政治環境的惡化，國家特別傾向用武力而非外交談判解決衝突，2022年以來的烏克蘭戰爭，24年的加薩戰爭，26年的委內瑞拉皆是，特別今年二月底的美以兩國對伊朗進行的斬首與大規模轟戰，都促使英國必須重新審視其國防戰略。只有當英國政府公佈其長期承諾的國防投資計劃時，各界才能確認英國是在否快速變化的國防需求方面猶豫不決，還是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Starmer在2024年7月入主唐寧街後不久即啟動新的戰略國防評估（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SDR），並在一段時間的延遲後，於隔年6月的北約峰會前發布該份報告並承諾英國將遵守北約新的國防開支目標，即到2035年國防開支將佔GDP的3.5%，外加1.5%用於更廣泛的國防基礎建設。

公布之後立即面臨的問題乃是英國財政如何負擔這筆額外的支出？Starmer政府面臨四個艱難選擇。如前所分析，如果增加借貸必然推高負債，引發更嚴重的財政問題。另一個選項似乎更不可行：提高稅收，因為如此一來，不僅打擊經濟競爭力，而且也緩不濟急，更會失去選票被迫下台。剩下的選擇，不論是削減社會福利或削減其他政府開支，都會引發社會與弱勢族群的抗議。過去十幾年的財政緊縮已經讓多數政府部門的預算瘦到見骨，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進一步削減而不影響政府運作。

雪上加霜的是，戰爭與安全威脅迫使英國於2025年6月採購昂貴的12架F-35A戰鬥機，目標在強化英部隊在北約內的核威懾能力。這批戰機具備攜帶美製B61-12核

炸彈的雙重用途能力，這是英國冷戰後首度增強陸基核戰力。雖然增強與北約的連動性，但一方面也增加對美國軍事體系的依賴，並對總預算的分配產生壓力，更會擠壓發展本土國防工業的資源。除此之外，也牽涉到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川普本人與其行政團隊不斷的批評歐盟與北約，尤其在北約不願意配合美國在伊朗的軍事活動，都引發歐盟與北約成員國對美國是否遵守《里斯本條約》第五條感到懷疑。這時候談論歐洲戰略自主雖然時間點契合，對面對尚未結束的烏克蘭戰爭，**Starmer** 有著無比的焦慮。雖說川普的總統任期只到 2028，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承諾是否會在 2029 年 1 月下一任總統上任後恢復，只有少數人會感到樂觀。也有論者擔心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其實已經結束。鑑於過去 80 年來英美防務整合的現狀，這使得英國尤其脆弱。

結論：國防支出與歐洲整合的未來走向

美伊戰爭與歐洲區域安全正迫使英國重新定義其在歐洲防務中的角色。其中，英國與德國、法國、波蘭被列為決定歐洲安全未來的四大重鎮，其國防決策將在未來十年內主導歐洲的集體安全。這乃是地緣政治壓力的催化作用，中東戰爭引發的安全與經濟危機，正迫使英國在脫歐後重新審視其與歐洲的關係而向歐洲靠攏。危機正推動英國在戰略上加強與法國的聯繫。英法正針對核武合作進行持續討論，這對於建立歐洲自主的核威懾力至關重要。英國與北約盟友已經同意，雙方必須增加支出、提供更多並加強協調。面對接二連三的戰爭，英國與歐洲的合作從單純的經濟合作轉向更深層次的安全防務協調。隨著北約防務開支目標的提高，英國將難以在全球影響力與歐洲區域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後者可能強化英國與歐洲盟友在防務工業上的合作，而且更為務實，如此才能應對戰爭帶來的長期威脅。

雖然財政狀況緊張，倫敦仍然維持著核威懾力量以及一支規模雖小但可隨時部署的陸海空聯合部隊。工黨政府應該在戰事頻傳，美國不願協助的狀況下，進一步擴展國防產業。中東戰爭一定會引發歐洲國家進一步提升軍備，英國選擇靠近歐洲不但明智而且會帶來訂單。倫敦龐大的預算和穩固的國防工業基礎使其有潛力成為歐洲國防重要部分。歐洲整體防禦已經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應該迅速增強常規部隊的力量，並逐步建立更具說服力的歐洲核子威懾力量。以德國為例，到 2029 年計畫每年在國防上花費約 1,890 億美元，接近於俄羅斯全面動員後的戰時經濟規模。這四國的聯合國防行動能否為歐洲提供足夠的防禦能力來應對俄羅斯的侵略，能夠從根本上阻止俄羅斯發動侵略，只有速度與行動能夠證明。